

元
白
詩
選



中國文學名著叢選

元白詩選

蘇仲翔選註



春明出版社出版

內 容 提 要

元稹和白居易，是繼承李(白)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元白之間的唱和最多，所以當時稱為「元白」。元白的諷諭詩和新樂府的共同點就是批判現實，反映生活。就形式而論，也是豐富多采的，是樂府詩中的一個重大改革。本書所選錄的，都是元白二人詩中最富於人民性的部分。導言中，詳盡地闡發了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內容和詩歌創作的實踐過程，同時，對於他們二人的風格異同，也作了扼要的說明。

元 白 詩 選

選 註 者：	蘇 仲 翔
出 版 者：	春 明 出 版 社 上海山西南路10弄3號
印 刷 者：	洪 興 印 刷 廠 上海山海關路406弄20號
經 售 者：	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書號：511

開本：762×1067 1/29

字數：160千字

頁數：145

印張：9 27/29

定價：1.12元

出版年月：195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8,700冊



元 稹 象

明陳洪綬作 香山四樂圖之一：「解廬」



導言

一 元稹、白居易詩歌創作的現實基礎

元稹和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李白杜甫以後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詩人。他們所處的時代和創作生活的現實基礎，正是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

安史亂後，王仙芝、黃巢起義前，約莫一百年間（七五五——八六〇）所謂中晚唐時期，正是中國封建統治內部分化、社會經濟變動極大的時代：政治上，一方面表現在擁兵割據的軍閥（藩鎮）和中央政權（朝廷）間的長期對抗；同時，進士出身的新興士族和墨守宗法家風的山東舊族間，又展開了迭相攫取政權的鬥爭；安史之亂雖平，外患並沒有解決，回紇一再跋扈、吐蕃先後入侵，形成種族上不可調和的矛盾。經濟上，由於安史之亂的關係，關隴河湟一帶遭受極大的破壞，全國經濟重心漸漸移向南方，由於江淮一帶物力的支持，使得封建的李唐政權，雖然國都長安屢陷，還能收拾破碎河山，暫得小康的局面。但是封建的莊園制度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大大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地主間的對立日益尖銳化；江南經濟雖曾一度繁榮，也因軍閥長期混戰，得不到正常的發展，縱有少數人發財致富，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不得改善。平定淮西後，曾經取得暫時的局部的穩定（所謂中

興），但整個社會經濟和國防力量，已經開始向下坡路，到了元和長慶時代，種種矛盾和危機，完全暴露出來了。

首先，由於均田制的破壞，和兩稅法的推行，對農民的剝削加重：兩稅法夏秋徵稅，規定收一部分現錢，但當時貨幣流通額不多，而農民只有實物，稅收時官方執行法令，農民只好用賤價賣出實物，商人和地主又趁機大放高利貸來盤剝，因此農民大吃其虧，小農經濟益發無法維持。他們有的把僅有的土地賣光，不得不租入地主的田地來耕種；有的因喪失土地，只好賣身投靠到官僚地主家中為奴隸。李紳詩中所謂「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的情況，就是這樣造成的。

加以軍費巨額的支出，官廷任意的揮霍，皇帝多方的聚斂，剝削無所不至。例如「變造法」，將全國各州縣正倉義倉存粟，變價購買各地輕貨輸送京師，以利貴族浪費。「進奉」皇帝以實內庫的，還有「助軍」、「賀禮」、「助賞」種種名目；甚至使宦官率領「白望」（在市場上瞭望，白取貨物不付本價）數百人，在東西兩市訛詐貨物，稱為「官市」，人民生活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整個社會幾乎上自皇帝下至僧道，都是剝削寄生階級。據李吉甫奏稱：天寶以來，國家養兵八十餘萬，其餘官吏商賈僧道不耕而食的佔人口十分之五六，等於強制三個勞筋苦骨的農民，供養七個待衣坐食的游手。真是慨乎其言之了。人民除担负額定的賦稅外，還有許多額外的負擔，如「間架稅」即房屋稅，「除陌錢」即公私付款及買賣成交時的餽錢，巧立名目，不一而足。

至於「和糴」，原是收購農產品充足軍糧的一種辦法，後來竟至不問年成豐歉，一律攤購強買，

使農民普遍破產。誠如白居易親身體驗過，在長慶集論和糴狀裏所說：

「比來和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人。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追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觀。」

可見當時收購農產品政策的流弊了。

社會經濟和財政措施既然這樣不合理，同時，無能的統治者對於擁有政治資本的強藩悍將，一味採取姑息政策，只求名義上還承認「朝廷」，也就任他們佔據土地、練兵修城、任命官吏、扣留賦稅，加深了地方勢力和中央政權長期的對抗；而且爲了排除異己，私植黨羽，統治者還有意任用宦官，造成宦官與朝士間不斷的排擠。代宗時魚朝恩、程元振曾爲天下觀軍容使，總管禁兵（神策軍）；各路都派宦官監軍，稱爲監軍使。憲宗時用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和各道行營兵馬使，統制中外諸將，專命討伐，權勢更盛。元稹在監察御史任內，曾因停止過貪官河南尹房式的職務，觸怒了宦官，還長安時，到了敷水驛橫受內官劉士元辱罵，還用馬鞭擊稹傷面，旋即被貶，出爲江陵士曹。無怪白居易要說：宦官凌辱朝士，不治宦官罪，反貶元稹，恐此後朝士不敢再爲朝廷出力了。

在這個宦官朝士相爭於上，軍閥胥吏搜括於下，經濟凋弊、政治混亂的社會，除了一些死心塌地爲統治階級幫兇幫閒的跋扈軍人和狼狽爲好的官吏外，朝士中稍有正義感的，無不橫遭貶斥，至如劉禹錫、柳宗元以及元稹、白居易等的相繼貶謫，更不是例外了。而當時農民痛苦無告的生活，貴族強

豪無法無天的罪行，尤爲與元白同時詩人如王建、孟郊、張籍、李紳等反映批判的好題材。他們都能運用樂府形式，從不同角度，把主題一般地集中表現在「憫農」的思想上，極深刻地描繪出當時農村經濟破產和階級分化的情形。晚唐文學的人民性和現實性之高，不是沒有理由的。

元稹和白居易出身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新興士族，處在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中，面對着社會政治經濟矛盾深化的現實，憑着他們一股銳氣和比較進步的政治傾向，自然站在人民方面同情農民無地申訴的疾苦；同時試圖運用文藝這一犀利的宣傳武器，來增強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這就是元白二人早期政治活動和詩歌創作的主要歷史契機。（他們的生活實踐過程詳見附錄元白簡譜）

二 元白詩歌中批判現實的意義

元白的文藝主張，基本上是繼承「六義」的，遇事託諷，以收「美刺比興」之功。題材選擇，既以有關生民苦樂「聞見之間有足悲者」（白居易）爲唯一對象；寫作動機又迫於刺「病時之尤急者」（元稹），所以他們的創作方向是非常明確的。一句話，諷諭的形式，現實的內容，從火辣辣的生活鬥爭中，採取典型的新鮮事件，加以最生動的刻劃，通過形象、反映實質，集中表現，重點突出，這便是他們主要創作的基調。亦即元稹所謂「寓意古題，刺美見（讀作現）事」；白居易所謂「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的總作用。

元白所一致重視的諷諭詩，包括古諷和樂諷在內，正是批判現實、反映生活的重要武器。尤以他們担任諫官、供職翰林時期的作品，無情地揭發統治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無休止的剝削和殘酷的階級關係，含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現實性，爲了說明方便計，似可分爲下列幾大類，試徵引二人作品，加以分析。

一、反映人民一般疾苦和貧困的：如元稹的織婦詞、田家詞，白居易的觀刈麥、村居苦寒、采地黃者、道州民等都是。元稹在同州日寫過一首旱災自咎貽七縣宰詩，羅列人民疾苦，做出「爲政不仁」的結論，因說：「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爲旱一州，禍此千萬人？」接着發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歸來重思付，願告諸邑君，以彼天道遠，豈如人事親？團團囹圄中，無乃冤不申？擾擾食廩內，無乃姦有因？軋軋輸送車，無乃使不倫？遙遙負担卒，無乃役不均？今年無大麥，計與珠玉落，村胥與里吏，無乃求取繁？符下斂錢急，值官因酒噴，誅求與撻罰，無乃不逡巡？生小下俚住，不會州縣門，訴詞千萬恨，無乃不得聞？強豪富酒肉，窮獨無芻薪，俱由案牘吏，無乃移禍屯？官分市井戶，送配水陸珍，未蒙所償直，無乃不敢言？」……這種對於人民疾苦全面的概括，集中的提問，是爲過去詩人們所沒有的，恰恰是元白諷諭詩的特殊風格。白居易在村居苦寒一詩裏，用的又是一種對比的形式：

「……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絁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隴畝勤。念彼心可媿，自問是何人！」

這和白氏另一首觀刈麥的表現手法相同，因物及人，由人及己，推己及人，對比之下得出結論：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之私自媿，盡日不能忘。」顯得非常自然，純從實際生活的體驗得來，決非沒有血肉的概念公式化的文字所可比擬。

二、諷刺橫征急斂、貪污強暴的：如元稹的採珠行，痛刺官家的與民爭利；捉捕歌主張先從侵蝕內部的螻蟻下手（兩詩詳後）；都是暴露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一面的。白居易在這方面，表現的尤其集中而突出，如重賦、杜陵叟、黑潭龍、賣炭翁、宿紫閣山北村等都是。重賦一首，控訴一些地方官吏爲了討好皇帝，充實內庫，到處搜括農民的血汗，結果讓它在倉庫裏霉爛，化成了灰塵。作者借農民口吻說道：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繪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另一首杜陵叟，也運用同樣手法，控訴催租吏：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真是一篇斬釘截鐵、充滿了憤怒的判決詞。

描寫貪污的，白居易有黑潭龍，全詩以龍比皇帝，狐狸老鼠比貪官污吏，豚比無辜的小民，直刺當時剝削人民、進奉財富以邀恩寵求相位的藩鎮，揭開了封建王朝大貪污集團的醜惡內幕，和重賦一首有互相映發的地方。又如宿紫閣山北村一詩，寫神策軍人的強暴；賣炭翁一詩，寫官市「白望」的擾民，都是非常形象化，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就是白居易自承「不懼權貴怒」的作品。

三、攻擊豪門貴族的荒淫無恥的：白詩如輕肥、傷宅、歌舞等，尤爲顯著。輕肥一首鋪陳內臣盛筵「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之後，叫出了「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一首描寫大雪夜侯門歌舞歡酣，「日中爲樂飲，夜半不能休」之後，叫出了「豈知闕鄉獄，中有凍死囚？」把豪門貴族荒淫無恥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闕鄉農民欠賦被囚凍死的情形，作了強烈的對比，給人們的鼓動力非常深刻。又如詩中「尊疊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輕肥）「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歌舞）等句的渲染，雖然藝術上是受了杜詩「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的影響，但主要還是由於白居易「身爲諫官，月請諫紙」，有意揭露這些事實，借諷諭詩這一宣傳武器，通過統治階級上層關係，來達到政治上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詩歌特別富於鬥爭性，較之杜甫的止於反映、止於批判，是更向前發展一步的；難怪他的秦中吟一出，就使得「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了」。

四、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的：元稹最有名的一首是夫遠征：「坑中之鬼妻在營，髮麻戴經鵝雁鳴；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成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白居易最有名的一首是新豐折臂翁：「邊功未立生民怨，請問新豐折臂翁。」主題尤見明確。不過元詩還憑着古樂府的格調；白詩顯受杜甫兵車行的影響，「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了。這是白氏五十首中極工之作，後來元稹的連昌宮詞，假宮邊老人之言，指出開元天寶的治亂，繫於宰相之賢不肖，歸結到「老

翁此言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其深戒用兵之意，正與白詩「老人言，君聽取」以下一段相同，足見元白二人對於天寶以來開邊政策的憤慨之深了。

五、提出其他社會問題來：關心婦女問題的，元稹有上陽白髮人，寫出「天寶年中花鳥使」採取豎異的悲劇；白居易會和過一首，開頭即說：「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同時，他在議婚裏指出「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的不合理；在井底引銀瓶裏，提出「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的結論，這些都是同情婦女們的。

勸戒奢侈浪費的：白居易有紅線毯、牡丹芳、買花等。紅線毯一首說：「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買花一首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都是有名的例子。

針貶嬖幸習俗的：元稹胡旋女，說姦佞足以顛覆國家。又有估客樂，諷刺商人惟利是圖，可以看出當時商人投機取巧的一斑。至如白居易的海漫漫針砭求仙的虛妄，古冢狐告戒女色的惑人，五弦彈致恨音樂的庸俗化，都是針對時俗而言的，富有批判現實的意義。

此外，關心人道的，元稹白居易都有縛戎人一題，寫出邊兵硬被人當作蕃人的冤枉；白居易的道州民，特別指出當時賁民爲奴的不人道。諷諫執政將吏的，元白又有西涼伎、蠻子朝等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至於不屬諷諭範圍的其他紀事詩，如元白的夢遊春詩中對於當時仕女裝束的描繪，元稹的琵琶

歌、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對於唐代樂譜舞姿的形容，都不是泛泛虛擬之筆，而是富有高度參考價值的文化史料。這又是元白詩歌現實性的一面。

總之，元白對於詩歌創作，既有着他們一貫的正確理論，同時，由於他們都出身貧寒，接近人民生活，又都當過諫官，少年銳志，知無不言；所以能够把一切耳聞目覩可歌可泣的事，一一羅列起來加以集中和概括，通過形象化的典型描寫而出以民間所喜見樂聞的形式。無怪元稹的連昌宮詞流入禁中，宮人競稱為元才子；白居易秦中吟及新樂府一出，便遠近傳誦，以至長安名伎都以能讀秦中吟自抬身價，且以認得秦中吟作者為榮。他們二人詩歌力量的偉大深入，可以想見了。

三 元白詩歌創作的新方向新面貌

元白一派詩歌，有繼承古代形式的，有自創新聲的，亦有改進古代和吸收民間形式的。二家詩分類大體相同。

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中，詳分已詩為十類：

- (一) 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
- (二) 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 (三) 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 (四)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 (五) 七言律詩；
- (六) 五言律詩；
- (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
- (七) 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 (八) 悼亡；
- (九) 五七言今體諷詩；
- (十) 五七言古體諷詩。

白居易在元九書中，則分已詩爲四類：

(一) 諷諭詩(關於美刺比興者)；(二) 閒適詩(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三) 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四)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編後集時僅分爲格詩、律詩兩大類。白詩前集既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於諷諭、閒適、感傷之卷；後集不復分類別卷，統稱之曰「格詩」，示別於「律詩」。就廣義說，格詩即今所謂古體詩；律詩即今所謂近體詩。這裏僅就元白詩中影響後世較鉅的幾種體製，略加說明。

一、古題樂府與新題樂府 元白二家都有新題樂府的作品，而發端首唱的，却是李紳(公垂)。從古題樂府到新題樂府的發展，最早的理論根據，詳見元稹的古題樂府序：

「沉自風雅至於樂府，莫非興諷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餘，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古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這裏有兩點可注意：(一) 古題樂府到元白手裏，已不再「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而發展到「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如元稹所和古題樂府十九首，自夢上天至估客樂，即是采古人的精神而不襲其面貌的。(二) 「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即李紳所首唱。元稹所擇和、白居易復擴充之爲五十首新樂府，蔚成有唐一代詩歌的名著，成爲

歷代詩人習作的典範。

新樂府李作不可見，元稹和作十二首似多不及白氏所作。一因元作往往一題涵括數義，不獨詞義複雜，主題亦不够明確；二因元作造句造詞頗嫌晦澀，不似白氏作品詞句簡單流暢，有如自然的散文，卻又富詩歌之美。白氏造句多以三七言參差相間雜，徵仿古樂府和李杜歌行，行文自由，無拘牽滯礙之苦。元稹所賦，尙守七言古詩的形式，所以沒有白作的瀟灑自然。

論到舊瓶裝新酒的古題樂府，元稹所作十九首最爲成功；其實亦是受白氏一題一意的影響而改進的。十九首中雖是全用五言七言的，但其中頗多以三五七言間雜而成，且有以十字十一字爲句的，長短參差，極盡錯綜變化的能事。

總之，無論古題樂府或新題樂府，體製雖有不同，要自「篇篇無空文」；其作用尤在「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這是白居易早歲「採詩」、「諷諫」理論的實踐，而新樂府輝煌的創造，正標誌着他在中國詩歌史上不可磨滅的功績。

二、所謂元和體 白居易重寄微之詩有云：「詩到元和體製新」，自注：「衆稱元白爲千言律，或號元和格」。按元和格即元和體，可分二類：其一指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其二指杯酒光景間的小碎詩章。這些都不是元白詩中的重點，亦非元白所自許的。元稹爲白氏長慶集作序就說：「……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唱，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元和體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白與元九書亦說：「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

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李肇國史補所謂：「元和以後，詩章……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稱元和體。」正指那種驅遣文字、窮極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間的小碎詩章。可見元和體一詞，在當時已非美稱；這是末流之弊，絲毫無損於元白本身創作的價值。像元稹夢遊春七十韻和白居易和夢遊春一百韻等詩，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的情感，妥貼入微，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可多見，影響及於後來的文學作家尤鉅。

至一般所稱長慶體，實亦兼指元白長篇敘事詩像長恨歌、連昌宮詞、琵琶行等別開生面的新格調而言。影響所及，如清初吳偉業的永和宮詞、圓圓曲，乃至近人王闓運的圓明園詞，王國維的頤和園詞，都是長慶體的仿製者。那種「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致宛然」（元稹上令狐楚啓）的組織形式，真是美極了。這和夢遊春等詩，都是元和體的上乘，未可與江湖間淫言嫖語，等量齊觀。

三、楊柳枝和短令 元白絕句，好作眼前景語，風韻天成。元作如江花落，白作如暮江吟（都見詩選中），都是活字活句，即景生情，可算絕句中的別調。到了竹枝，幾乎是山歌調子，更加口語化了。後來劉禹錫（禹錫）白唱和川東，率興吸收夷歌蠻曲，大做其楊柳枝，而且自稱「新聲」。

楊柳枝一名楊枝詞，亦曰柳枝詞，大抵寄興楊柳，抒寫兒女情懷，運用口語，以雙關白描見長。二人唱和各有八九首之多。劉作有云：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竹枝九首之一）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九首之一）